

文学中心的南移与30年代文人 “没海”的文化潜因

丁颖

(大连民族学院 文法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05)

摘要:20世纪30年代,文化中心南移上海。上海以“梦工厂”的形式使源于都市的现实体验在文学上得到落实,一方面言明了中国现代的文化消费市场在上海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昭示着极具“现代质”的城市本身所承载的文化含量。通过阐释文学中心的南移,挖掘出30年代文人“没海”的文化潜因,从而完成对知识分子和城市关系的文化反思。

关键词:30年代;南移;文化潜因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志码:**A

Southward Migration of the Literary Center and the Cultural Reasons for the 1930s' Litterateur's Immersion in Shanghai

DING Ying

(College of Chinese and Law, 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605, China)

Abstract:In the 1930s, the literary center migrated southward to Shanghai. In the form of “Dream Works” in Shanghai,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riginated from metropolis was implemented in literature, which, on the one hand, indicated that the Chinese modern cultural consumption market was formed in Shanghai, and, on the other hand, expressed the cultures that the extraordinary modern city itself conveyed. By expounding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of the literary center, the paper probes into the cultural factors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writers' immersion in Shanghai, thus completing the cultural refle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city.

Key words:1930s; southward migration; cultural factors

20世纪30年代,上海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建构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经济实力,外加19世纪中叶开埠通商之后所带来的巨大助推,在近百年的跨越性发展中,一跃成为世界意义的国际性都市、金融中心、远东第一大港口和商埠、全国最为富庶发达的城市。“到19世纪60年代,上海的外贸出口便超过了它的对手——中国最早的

通商口岸广州。上海将这一荣誉整整保持了120年。”^[1]现代社会则显现出社会功能的有序分离,经济的富足和充裕创生着富有弹性和活力的物质条件,相伴而生的是良性的文化生态环境,滋养着文化的根苗多元勃发。上海的城市发展正符合这一基本规律,以商业经济为中心的上海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跨国商行、商号林立,跑马场、电影院、咖啡馆比比皆是,风姿绰约的上海以其扑面而至的现代气质向世人展示了高效、富足、进取的现实

收稿日期:2014-03-31;最后修回日期:2014-04-17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DC110401)。

作者简介:丁颖(1975-),女,辽宁大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精神,将实存的示范效应和非同寻常的传奇魅力延展到未曾经历的领域,最终促成了社会中心和文化中心的重叠聚合:“许多人已经忘记——或许根本不知道,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乃是整个亚洲最繁华和国际化的大都会。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是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2]

澳大利亚学者蔡尔德提出了表明城市文明到来的十条鉴定标准:大型居住区,财富集中,大规模公共建筑,出版物,表演艺术,科学知识,对外贸易,从事非生产劳动的专业人员,阶级社会,以居住区而不是亲属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组织。而在这其中,衡量城市的文化质素和性格内涵的则是它的容受力,它的移民程度及对城市的建构者——知识分子聚合起来的机制和能力。伴随着20世纪2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政治格局的巨大变迁,原本就具有浓厚的“移民”历史的上海则迎来了再一次的移民高潮,而这次较为集中的群体位移,创生着30年代中国文坛最为显赫的文学力量。根据章清和忻平的研究来看,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1927年前后是全国文人集中迁居上海的年代,在这浩浩荡荡的迁移过程中,“有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或进步作家,包括南昌起义回上海的郭沫若、阳翰生、李一氓;从武汉来沪的茅盾、蒋光慈、钱杏邨、孟超、杨邨人、宋云彬、汪原放、孙伏园、林语堂;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夏衍、冯乃超、李初梨、朱镜我、彭康、王学文、傅克兴、李铁声、沈起予;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徐霞村、巴金,从南洋流亡归来的洪灵菲。此外柔石在家乡参加农民暴动失败后来到上海,刘呐鸥从台湾返回上海,李璜从重庆来到上海,李锐峰等从北京逃到上海。除了这些不期而至的客人,当时的上海已经居住着大批知识分子:张元济、蔡元培、朱经农、王云五、高梦旦、徐新六、汪孟邹、周建人、叶圣陶、夏丐尊、赵景深、郁达夫、张君勱、张东荪、施蛰存、戴望舒等。”^[3]众多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南移上海,造成30年代的上海举世瞩目的群星荟萃的活力和繁盛,这是一个不多见的文学现象。30年代不同思想倾向的作家们在其作品中所流露出的“上海经验”,应该和这场较为集中的上海记忆有着关系。聚散离合中显现着上海城市特出的魅力,上海的召唤性和隐喻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挥发,上海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主体。

二

文人“没海”,自是为了寻找适宜之地。城市空间的变异必然引起文化生产方式的变化。北京时期的知识分子所置身的文化体制建立在政治权力的基础之上,这一前提决定了他们从事的是国家体制内的知识生产,创作本身与生产和利益关系不是十分密切。到了上海,这种体制内的知识生产已经失落了作为“场域”的外部环境,从而逐渐打破了作家——作品之间传统的写作关系。作家不仅要关注创作主体与作品之间的内部联系,在接受的层面,会出现“拟定”的读者,并将他们作为衣食父母,作家的职业化成为势之所趋。在近现代知识分子逐渐职业化的过程中,上海本身作为成熟的文化市场,为20世纪30代的知识分子提供言说和表达的空间,对文人和学者既有吸引的魅力,又有养育的功勋。对上海而言,这一极具媒介效应的“场域”的形成与上海开埠通商的殖民历史关系密切。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人看到了作为移民城市的上海是一个充满着无限商机的巨大市场,在经济领域加大投资和通商外,同时在文化领域,则加强了思想渗透和宗教言说的密度,以获得文化上的殖民认同与传播利润。在一个英国传教士的通信中这样写到:“别的办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的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4]西人先后在上海创办各式印刷机构、出版集团及影响深远的报刊杂志,如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最早的墨海书馆,同时也是近代重要的翻译外国著作的机构。1887年上海最大的书报编译印刷机构——同文书会成立,在甲午海战中引起轰动影响的《万国公报》以及中国报业历史上最富现代意义的报纸《申报》等等也先后得以创办,这些商业气息和文化色彩兼具的传教士出版机构和报章传播着现代西方的思想和观念,同时也将现代的出版手段和技术作为“洋务”之一种传到上海。1843年,有中国“新出版第一人”之称的近代文士王韬在墨海书局做编辑时,第一次见到机械印刷机,颇为感叹于西方印刷机的惊人速度:“车轴旋转如飞,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也。”1896年8月9日,梁启超偕同黄遵宪、汪康年将中国人的第一份报纸《时务报》创刊于上海,在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提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有益于国事”,提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其有助于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

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5]在这种严肃明确的启蒙理念关照下,加之运转得当的经营理念,《时务报》发展迅速,影响达至全国,发行量从4 000份增至1.7万份,创历史最高记录。后梁氏又在上海开办了大同译书局、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小说》,为近代翻译事业及现代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均为上海作为现代文化中心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上海作为最大的移民城市,得风气之先,加之江南文化的孕育滋养,创生着近现代上海社会中具有鲜明现代意识的新市民阶层,他们是上海社会最为集中和忠实的文化消费群体,从而使上海作为最大的现代文化消费市场提供着持之有续的人力资源。他们的消费取向刺激着现代传媒的基本走向,现代传媒市场的文化产品引导并满足着他们对新的现代生活和人生的渴盼。正如李欧梵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所分析的那样:“在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至少已有20年,都市文学刊物——半现代化的‘民众文学’,已经为日后新文学的作家们建立了市场读者”^[6]于是那些学贯中西、思想新锐、见多识广的知识分子同时为上海的文化市场倾力输入新鲜的血液,随着作家们的集中迁入,也注意对“思想的战场”的引入和辟设。原本创办于北京的《语丝》在北京出了三年之后,被张作霖政府查封,于1927年12月,迁至上海出版,由鲁迅主编,继续发挥着语丝同人真诚勇猛、泼辣犀利的论战风格,为上海的文化空间带来强有力的影响。随后《奔流》《前哨》《北斗》等进步刊物相继诞生,成为宣传新思想新观念的理论阵营,也显示着鲁迅对“思想市场”的适应和重视。1924年创刊于北京的《现代评论》,提倡“独立精神”,养育着现代评论派为主的文人学者。计出九卷二〇九期,终刊地点在上海,其生命流程与现代评论派的编辑群体的地域选择休戚相关。由“聚餐会”演化而来的新月社1923年建立于北京,取址于北京松树胡同7号,集结了一批受欧美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熏陶和影响的学院派文人,自1926年下半年始,随着北方文人大部南迁潮流的涌动,新月社的骨干成员也先后来到上海。为实现个人价值并发挥群体影响,胡适和徐志摩动议成立了新月书店,并配合出版了《新月》月刊和《新诗刊》等。这些自由主义文人虽最终难以兼容于探奇览胜、众声喧哗的洋场社会,30年代初这些胡适派文人纷纷离沪北上,但初步显示了新月同人在上海时期弄潮海

上、搏击现代媒体市场的生动面影。30年代的上海文坛,一些新的文学团体和刊物层出不穷地出现,扩大着上海作为文化出版中心的领域和阵容。大上海的包容性和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生产空间遇合着现代知识分子的职场需求,并为他们的言论提供着“思想的市场”。在报人、作家、读者深度遇合的基础上,包括商务印书馆、北新书局、泰东图书局、开明书店、亚东图书馆、光华书局、中华书局等众多的知名出版机构的苦心经营和着力奋取,至30年代,上海的出版业以势如破竹的发展态势,进入了前所未闻的黄金时代。据1931年《上海商业名家》中记载,“在沪出版社136家,报社48家。到20世纪30年代包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大型印刷企业均在内的80%的印刷企业均在上海,全国90%的图书、80%的报刊出自上海。”^[7]

三

文人“没海”,也是为了寻求安全之地。上海租界作为“国中之国”,拥有立法、司法、行政一应俱全的市政管理机构,特殊享有“法外治权”,不允许“在任何方面影响公共租界的地位,任何中国地方当局均无权干涉公共租界的自由。”^[8]租界有自己的警察和武装——万国商团,有自己的立法机关——纳税人会,有公部局,法租界称为最高的行政机关。还有自己领事公堂、领事法庭,会审公廨等司法机关。租界还有各母国政府和军队的撑腰,随时可以护侨等名目遣军队赴沪租界,1927年4月间,各国在沪租界的军队有四万余人^[9]。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租界相对“自治”、“独立”的政治形态,从而成为政治流亡人物的护庇之所。1903年那场震动朝野的“苏报”案,即是发生在上海租界里,并在“国中之国”内经过了七次公开审理。故清政府重办章邹二人的企图告败,颀颀昏昧的清政府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外丧失了老大帝国的权威和尊严。新闻史家胡道静在《上海的日报》中说:“苏报案在历史上的意义很大的……以后的上海言论界、出版界多数集中在公共租界,这件事有莫大的关系。”^[10]1898年戊戌政变后,黄遵宪避难于上海而免于清政府的迫害,为此蔡元培这样加以分析:“盖自戊戌政变后,黄遵宪逗留上海,北京政府欲逮之,而租界议会以保护国事犯自任,不果逮。自是人人视上海为北京政府权力所不能及之地。演说会之所以成立,

《革命军》、《驳康有为政见书》之所以能出版,皆由于此。”^[11]

当北京政治高压愈益浓重而上海租界作为满清政府统治的薄弱地带则引发了北方文人的“向往”之心,胡适、罗家伦、傅斯年半是愤怒、半是解气、半是无奈地说道:“把北大迁到上海租界去,不受政府控制。”1927年9月27日,鲁迅携许广平定居上海,他们在上海的第一个落脚的地方“共和旅馆”即在租界范围之内,此后十年间先后有过三个寓所,即景云里23号,拉摩斯公寓和大陆新村9号,均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租界化区域,包括后来避难之所也均是租界和半租界,所以有《且介亭杂文》和《且介亭杂文》二编、末编等“半租界”之作。上海不仅是全国范围内各界人士安身立命之所,同时也是国际流亡人士的保护伞,上海这种特殊的空间意义使现代文化人和政治人士拥有了生息和创造文化事业和革命事业的缓冲地带,它既是产生现代文明的洋场社会,又是中国近现代社会革命的策源地,还是现代文化多样化创生的摇篮。它比其他任何一个城市更具有文化的兼容能力和现代文明的生命素质,它比其他任何城市都符合现代都市文明发展的自然形态,正如“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基本标志”所陈述的,现代的文化走向也必然由庙堂书斋走向稠人广众中去(郁达夫语),由封闭自守走向开放现代,由异质和另类走向同构与认同。

30年代的上海以她宽容、开放的胸襟,容纳着形形色色的人们,也吸引着不同的文学力量在都市上海集结,形成了30年代上海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话语场”,形成了不同的文学力量对上海的“叙事”和“想象”。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上海是现代中国的象征,更是中国现代性困境表达的核心地带。30年代影响深远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基于对上海社会的纵深理解而展开的对整个中国社会走向及相关问题的思考。在“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左翼文学”所形成的30年代文坛的主体格局里,上海往往成为绕不过去的“想象源”,也是“影响源”和“辐射源”,是作家们灵感的源泉,是他们纵深思考中国、思考世界的起始。都市上海为知识分子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提供着情感的依托和物质的保障,都市知识分子的存在则平增了城市的生机和魅力,建构着城市的丰盈与深邃。同时,知识分子

与城市之间逐渐地清晰着这样的一种关系,既融入又疏离,城市成为他们难以摆脱的宿命,一旦进入就难以脱离。它们相互依存着,补充着,也互相影响着,改变着。关于这一关系的体验和理解,则构成了不同作家和文人主体意识下的“上海”。鲁迅后期创作的杂文、《故事新编》中的部分作品、茅盾笔下的《子夜》以及他的都市女性系列,刘纳鸥、施蛰存、穆时英所代表的“海派叙事”,沈从文对“都市人生”和“衣冠社会”的理解,丁玲塑造的梦珂和莎菲很明显地代表着都市女性的特征,她们的遭遇和体验是都市女性成长的历史,也是对都市化、现代化城市的言说,从而形成了不同层面的对于上海城市的发现和表达,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多维的但同时无从整合的“上海形象”。上海,既让世人唏嘘感慨,痛心诅咒,又让人痴迷不已,难以忘怀,上海成为了解中国社会的钥匙,更是30年代作家和文人们生存的空间,激情倾注的对象,思想出发的地点,是30年代文学创作的元叙事。这是一个确切的文学事实,其价值必将指向过去和现在,也遥指不远的未来。

参考文献:

- [1] 杨东平. 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3.
- [2] 白鲁恂. 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J]. 二十一世纪, 1992(9):16.
- [3] 章清. 亭子间:一群文化人和他们的事业[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3.
- [4] 江文汉. 广学会是怎样的一个机构[J]. 出版史料, 1988(2):34.
- [5] 梁启超.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饮冰室合集一[M]. 上海:中华书局,1934:100.
- [6] 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444.
- [7] 张树栋. 百年回首话印刷[N]. 中国图书商报,2001-05-15.
- [8]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2.
- [9] 台湾民国史料研究中心.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M]. 台北:1984:4.
- [10] 杨光辉. 中国近代报刊发表概况[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331.
- [11] 蔡元培. 蔡元培全集:第1卷[M]. 北京:中华书局, 1984:400.

(责任编辑 王莉)